

聚落文明与单元建构

——云南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逻辑与时空发生

杨华刚¹, 刘 琪²

(1.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2. 苏州大学建筑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要: 石屏地区数不胜数的历史聚落成就了其滇南大地风云荟萃的盛况格局, 文章通过解读石屏地区历史发展主线及其时空更迭, 还原其历史情境并思考历史主线与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建构关系。最终提出要从历史人类学、边疆发展史和社会经济史等角度挖掘当代历史文化聚落背后内在的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 并尝试求证历史文化聚落环境单元模式形成的可能性。

关键词: 云南石屏; 历史文化聚落; 历史发展脉络; 生成逻辑; 聚落环境单元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Settlement Civilization and Unit Construction

——The Generate Logic and Spatio-Temporal Occurrence of Historical-Cultural Settlements in Shiping Area of Yunnan

Yang Huagang¹, Liu Qi²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Numerous historical settlements in Shiping area have formed the grand pattern of historical gathering in southern Yunnan.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historical develop line and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 of Shiping area to restore its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considers the 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line and regional historical-cultural settlement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frontier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tc.,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expression form and generation logic, 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unit of historical-cultural settlements.

Key words: Shiping of Yunnan; historical-cultural settlemen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generate logic; settlements environmental unit

杨凡、徐鹏海执导的影片《主播流浪记》(原名不期而遇)在2017年中国(昆明)金孔雀青年电影节闭幕式上荣膺七彩云南·古滇名城“最佳民族影片奖”和云南民族影展单元“最佳影片奖”两个奖项。影片集时尚、民族歌舞于一体,全程取景于云南石屏县境内,并有部分本土演员、群众参演,讲述了一位彝族姑娘成为网络主播后面对现实瓶颈和困难而选择了逃避,在其经纪人陪同下回到了离开十余年的家乡石屏慕善村寻找音乐初心的故事。

从电影文化艺术的角度对一方地域环境展开诠释是一种较为外显和通透的书写手法。电影对石屏地区环境的刻画也更多地聚焦于文化资本及其娱乐范式角度,而对石屏地区深厚的空间地文及其时空环境等深层结构的涉及较为薄弱和匮乏。那么,电影之外的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是否如同电影画面呈现出来的那般乐观和温暖,很显然,电影剧情和画面之外的地区图景或许更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挖掘、描述和转译。

1 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历史脉络与更迭

石屏是云南省红河州的下辖县,有“文献名邦”“建筑博物馆”“歌舞之乡”等美誉。1999年1月石屏被列为云南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015年1月石屏老城区历史文化街区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辖区内郑营村2008年12

作者简介: 杨华刚(1992-),男,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城乡规划与设计。

月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国家级传统村落共41个,其余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达25处之多。石屏地区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聚落成就了其滇南历史风云荟萃的盛况格局,通过解读石屏地区历史发展主线及其时空更迭,还原其历史情境并思考历史主线与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建构关系,从历史人类学、边疆发展史和社会经济史等角度挖掘其背后内在的表现形式及其形式逻辑。

1.1 石屏地区地域边疆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从地域边疆发展角度来看,云南地区长期处于多重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即汉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文化的北部边缘^[1],文化圈层的地缘边界现象造成了云南历史文化的多元混杂与张力交融,也反映在村庄生活、生产的物质空间形态中,最终形成了云南典型的风貌特征,是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并有其独特的变迁规律^[2]。石屏地区的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层面均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与发展方向。

1.1.1 边疆民族的多元与流变

商周时期,今云南地区被称为“百濮之国”。“濮族”指的是远古至秦汉时期散居于楚西南(今长江中上游、云贵川地区)地区多种民族的统称,因其民族众多而称“百濮”。石屏地区民族最早可追溯至“藏彝走廊”南下的氏羌族群、“南岭走廊”西迁的百越族群和东南亚北上的百濮族群三大族群^[3]。蒙古征滇和明初沐英入滇等军事征伐和移民屯边活动中,大批中原民众不断迁入云南地区并最终彻底改

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汉族逐步取代少数民族成为石屏地区的主体民族。汉族移民聚落以军屯、商屯等形式依托卫所、交通干线等向传统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拓展推进,逐渐演变成新的汉族移民区^[4]。在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石屏地区从少数民族集聚到汉族介入,最终形成了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多元共进局面。

1.1.2 边疆经济的发展与转型

受制于地区边疆政权行政主体的多元交织现象,石屏边疆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和属性特征,地域统辖、开发程度、民族主体等客观因素致使石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且封建领主、官僚地主、军屯民屯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自明初沐英入滇征讨和屯田伊始,大批江南汉民入滇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石屏地区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生产格局的地域分布,形成以石屏异龙湖流域封建地主经济和边缘地区部落经济并存的局面。近现代以来,受到清末矿冶开采和近代化工商业发展的影响,石屏地区从传统农业型社会快速转向了近现代工商业经济社会。同时,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地方矿冶工业引发的外国资本殖民窥伺和入侵,地区经济形态更加复杂和多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随着原始经济、封建地主经济等的瓦解,石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差距相对缩小并步入了转型阶段。

1.2 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发展主线及其时空更迭

对石屏地区边疆政权、民族、经济要素及其时代发展流变的探讨,无论是基于历史法则诠释(如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界定)、历史共时性分析(如区域史或专门史研究),还是历史脉络解释(如历史朝代划定)等都可以梳理出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从无到有及其发展变迁中的历史主线。尤其是西南边疆地区,更需要视区域发展为一个有生命、连续动态的进程,立足于社会民众行为发展与地区文明中心生成的向下式角度去讨论石屏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与民众日常生活经营等概念探讨的同时,也可以为概念诠释注入历史性活力。

石屏最早称为“邑”，意为“有人集聚居住的地方”，基于社会民众行为发展与地区文明中心生成的向下式角度看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发展主线及其时空更迭也是立足于其原始本意而言出有据。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发展与地域边疆发展脉络具有高度一致性，社会形态的演变脉络与转型痕迹都深刻地反映在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与演变中。元朝筑城和明朝移民屯边以来的数百年发展中形成了以异龙湖片区为文明中心地、交通线路牵引布局的历史文化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见图1）；同时随着矿冶开采和殖民入侵，围绕富民阶层置田筑屋和铁路线路带动，形成了近代历史文化聚落的新一轮时空分异。透过空间分布现象可以看出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及其时空发生均伴随着民众社会行为的演变，并受制于地区文明中心的辐射带动。

2 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轴线及其解构

基于社会民众行为发展与地区文明中心生成的向下式角度来探讨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逻辑与时空



图1 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空间布局(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发生,可以较为清晰地梳理出三条时空轴线并折射出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内生性逻辑与事件介入式干预,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形态、交通线路空间和富民社会阶层三个层面。

2.1 社会经济形态与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

社会经济是区域历史文化聚落生成的物质基础，传统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是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尤其是传统村落生成的历史土壤。元朝筑城、明朝移民屯边等彻底扭转了石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汉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介入在改变地区民族主体结构的同时，也促使地方部落氏族经济向传统农耕自然经济转变，大量军屯、民屯等农耕经济内向型传统聚落逐步生成，并主要分布于异龙湖流域等早期军政辐射范围内的平坦区域；矿冶开采及其附属经济业态和后续殖民入侵等促使石屏地区近代工商业经济体系迅速发展起来，系列交通线路空间、经贸据点等性质的历史文化聚落与区域经济体系紧密关联，并在内外交困的社会复杂局面下焕发活力。

2.2 交通线路空间与历史文化聚落的分异

交通线路空间是区域社会民众行为扩散和地区文明中心生成、交流的渠道。从地域空间结构来看,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主要分布于“坝心镇—异龙镇(县城驻地)—宝秀镇”这条“东南—西北”走向的地区交通线路空间地带,不仅反映在历史文化聚落的数量占比层面,也表现在其空间密度层面(见图1)。同时这条交通线路空间既是明清等历史时期移民迁移、茶马古道、经济商贸的线路空间,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滇越铁路“个碧石”路段(个旧—碧色寨—石屏铁路段)的走向空间。随着茶马古道、滇越铁路等交通线路及其商贸地位滑落,商品经济繁荣与自然经济瓦解,在市镇不再繁华且村落后远区迅速衰败的形势变幻下,石屏全域范围内也唯有交通线路空间辐射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聚落仍旧保持着较多的民众集散流动频次和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2.3 富民社会阶层与历史文化聚落的兴衰

民众阶层是历史文化聚落的创造者。自明移民屯边之后的五百余年,石屏(滇南)地区整体社会环境较为平稳,持久的农耕文明、茶马古道和工商业贸易、矿冶开采及其附属工业体系、殖民势力资本入侵等激发了地区经济活

力、商品贸易和财富积累,也促使石屏(滇南)地区社会阶层分化,“民”又一次发生新的分化,由此兴起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主要包括那些占有大量土地,靠土地经营致富的人和靠工商业经营致富的大工商业主,以及农工商各业兼营起家的人^[5]。富民阶层在改变地区社会主体结构的同时也积极广泛地参与了区域经济的社会分工与生产,通过置田置业、传文兴教等多种流动性渠道创造了众多类型各异、功能多元的历史文化聚落形态,如朱家花园(茶叶、丝绸、矿冶开采等资本积累)、袁嘉谷故居(云南唯一状元)、郑营陈氏(军屯后裔族居)等都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这些“富室”“望族”的衰败,也标志着富民社会的解体及其市民化社会的转变,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也渐入衰退期。

3 石屏历史文化聚落的环境单元模式形成与可能

从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逻辑来看,不仅有诸如地理区划、经济区划、交通区划等之别,还有文化单元、生态单元、风貌单元等多因素划定。那么,如何从烦琐复杂的多元划定中找到一个合理、适宜、清晰的范式理念来对历史文化聚落做一个全新的图景诠释和谱系辨识,并超越个案研究上升到区域性规划层面呢?从社会民众行为发展与地区文明中心生成的向下式视角来探讨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生成逻辑与时空发生,探索镶嵌在其背后不为人所察觉且迫切要去建构的核心——聚落环境单元,以达到从宏观层面去反映历史文化聚落的通用特点和识别那些具有相同形式结构的空间集合的目的,去找到那些相对独立和自成生境的历史文化聚落普适性问题的答案,进而实现通用特点、相同形式在相应区域范围内的空间界定及其生境系统的具体化。

从建构初衷和意图来看,聚落环境单元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认知的重要介质,也可被作为一种方法范式来判定历史文化聚落“物质世界”及其主体观念的空间集合。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的环境单元因其边疆政权、民族、经济要素及其时代发展进程中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和自成生境而得以呈现和传递出来,其形成与可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地域环境的封闭性,相互隔绝、区域孤立的地域环境客观现实既反映在云南与中原地区的历史发展联系中,也反映在云南地区内部地域单元(各坝子)之间,并形成了一系列相对孤立、自我的地区社会空间单元,这种内向封闭性也致使各历史文化聚落片区相对自成一方体系且独具地域特色;②区域板块的稳定性,自唐朝本地土著聚民为邑到近现代以来,石屏地区的区域板块一直稳定并延续至今,其稳定性反映在地理地貌板块构造的稳固,同时也反映在区域内部社会文化形态和地域时空发展结构

的稳定;③文化根基的内向性,农耕文化形态融合北方汉族儒教文化、宗族文化、礼俗观念等形成了具有云南典型特色的渔樵耕读的地区人居形态,内敛式的生产生活模式激发了地区高度的地域观念、文化认同和空间识别,“五步三进士,对门两翰林,举人满街走,秀才家家有”成就了石屏地区“文献名邦,状元故里”的美誉;④文明发展的持续性,文明发展的持续性不仅反映在以传统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区域文明发展历史久远的时间轴的持续性,也反映在以异龙湖流域为核心的石屏地区文明中心从生成发展至今仍旧保留着中心辐射带动作用的空间点的持续性。

4 结语

正如张爱玲所写的那般“只有一个孤独的影子,她,倚在栏杆上……她是时代的落伍者了,在青年的温馨的世界中,她在无形中已被摒弃了……电影似的人生,又怎能挣扎”^[6]。透过历史演变的迷雾和时代车辙的印迹去回望石屏地区的发展进程,以及历史文化聚落的时空更迭,从历史人类学、社会发展史等视角去审视石屏地区历史文化聚落是否如同电影画面中那么温暖乐观或是文学描述的那般灰暗不堪呢?很显然,过度悲观或乐观乃至折中都难以透视到其背后内在的形式表现与逻辑体系。尤其是在当前历史文化聚落连片成带消亡匿名的情景下,无论是基于建筑单体保护还是历史聚落个案研究等层面都难以为历史文化聚落的整体性保护、区域性规划及地区性体系建构等做出积极回应。那么,对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体系深究和路径尝试呢,或许就是立足于历史人类学、社会发展史等角度去还原历史文化聚落历史情境并挖掘其历史主线与地区民众行为、文明中心的建构关系,并求证历史文化聚落环境单元模式与区域板块形成的可能性所在。

参考文献

- [1] 杨大禹. 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7.
- [2] 陶楠,金云峰,庄晓平. 基于特征尺度下的海派传统村落风貌特征与社会语义研究[J]. 城市建筑,2019,16(15):109-110,117.
- [3] 谢本书,郭大烈,牛鸿宾. 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 [4] 刘学. 云南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保护体系规划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 [5] 林文勋.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J]. 史学理论研究,2006(02):30-38.
- [6]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迟暮(第四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